

研究論文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香港突發新聞之個案

黃天賜、黃煜、張美鳳、王悅

摘要

香港回歸中國，新聞工作者大多關心意識形態及權力的轉換導致新聞自由空間縮減，政治力量也借助科技力量，操控新聞資訊的來源和產製，對新聞媒體造成壓力。本文引用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 (field theory)，以突發新聞為個案，對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展開研究。透過新聞工作者的深入訪談，及突發新聞內容分析，本文同時探究新聞實踐及製品的變化。研究發現，警方更換數碼通訊系統後，突發新聞數量下降、記者的作業模式劇變，警方成了突發新聞消息最關鍵的守門人。同時，網絡媒體成為新聞消息的重要來源。科技在新

黃天賜(通訊作者)，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高級講師。研究興趣：新聞研究、政治傳播。電郵：wtinchi@hkbu.edu.hk

黃煜，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研究興趣：新聞與媒體表現、傳播政治經濟學。電郵：s03033@hkbu.edu.hk

張美鳳，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新聞研究、公關策略、社交媒體研究。電郵：meilycheung@hsu.edu.hk

王悅，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高級講師。研究興趣：新聞實踐、記者共同體。電郵：kenbess2000@hkbu.edu.hk

論文投稿日期：2019年7月15日。論文接受日期：2020年2月26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聞場域中的不同應用，對新聞場域有兩極性的影響，令香港突發新聞場域的他律性強，專業自主空間收窄。

關鍵詞：新聞場域、科技、突發新聞、新聞自由、後真相

Research Article

Jour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Case of Breaking News in Hong Kong

Tin Chi WONG, Yu HUANG, Meily Mei Fung CHEUNG, Yue Bess WANG

Abstract

Since China resumed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journalists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decreas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due to shifts in ideology and power. Indeed, political forces have also used technology to control the sources and production of news. This study adopted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breaking news after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police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journalists and news content analy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a reduction in breaking news, dramatic changes in news routines, and a shift in the news gatekeeping role from journalists to the police.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differently in shaping Hong Kong's journalistic field, which has experienced greater heteronomy and less autonomy.

Keywords: journalistic field, technology, breaking news, press freedom, post-truth

Tin Chi WONG (Senior Lecturer,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journalism studi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Yu HUANG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performanc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eily Mei Fung CHEU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journalism studies, public relations strategies, social media studies.

Yue Bess WANG (Senior Lecture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journalistic practice, journalist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6 (2021)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ong, T. C., Huang, Y., Cheung, M. M. F., & Wang, Y. (2021). Jour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case of breaking news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6, 25–61.

引言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香港報業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享有極低度政府管制(Chan & Lee, 1989)。當時新聞常規及實踐深受西方影響，本地傳媒及新聞教育採用美國的模式，記者亦需接受專業訓練(李金銓，1997)，香港的新聞專業體系基本上是奉行西方的自由主義，強調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1997年回歸，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主權轉移意味著權力中心改變。傳媒為適應新的權力中心，運作上必然作出相應轉變，傳媒工作者亦憂慮前景(Fung, 2007)。回歸初期，在基本法訂明「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原則下，對新聞自由的壓制鮮有以明顯形式或行動執行，但香港的傳媒環境卻越來越不利新聞自由，當中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及科技方面因素。過去，有關香港新聞媒體變化的研究多聚焦在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影響：有學者發現回歸後權力中心與傳媒的關係發生變化，主流傳媒傾向接近中央權力中心；¹亦有學者探討報章近年政治新聞報導的變化與政治、民意、經濟、本土意識之間的關係。²

與此同時，科技對新聞媒體的影響與日俱增，近年來成為另一股塑造報業變化的重大力量。Robinson (2009) 指出互聯網的出現不單改變報紙報導新聞的平台，更影響記者發掘和採訪的方式。Sheffer 及 Schultz (2010) 曾經探討社交媒體如何改變新聞範式。科技除了為新聞媒體帶來直接的影響外，經濟政治等力量亦藉科技因素對媒體作出不同的影響。例如，政權可以利用科技手段加強審查新聞資訊(Cheung & Wong, 2016; Esarey & Xiao, 2011; Howard, 2010)，市場主導令新聞業趨於追求點擊率和瀏覽量(Napoli, 2015; Paulussen, Harder & Johnson, 2017)。因此，本文認為必須同時從宏觀及微觀、外在及內部的角度探討，方能了解科技對新聞媒體的影響。

Benson 及 Neveu (2005) 認為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 是媒體及新聞研究一個可行的新典範，Willig、Waltrop 及 Hartley (2015) 指出理論有助研究者作關係性的探索，同時考慮外在、組織及記者的層面，亦可以檢視新聞機構的常規(routines) 和新聞專業的實踐(journalistic practices)。過去，不少學者研究證明 Bourdieu 的理論是適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用於分析媒體的理論框架 (Benson, 1999; Benson & Neveu, 2005; Couldry, 2005; Willig, 2012, 2016)。因此，本文認為新聞場域理論可供研究回歸之後，香港社會外在力量，特別是科技如何影響新聞場域，同時可以探討機構和個人行動者面對變化的適應策略和新聞實踐。過往有學者將場域理論應用於研究特定的新聞類型，例如English (2016)以場域理論為框架研究及梳理澳洲、印度和英國的體育新聞媒體，本文則以突發新聞作為研究個案。

選擇突發新聞原因有三。第一，突發新聞每日均會發生，每天大量意外和罪案新聞一般按既定的新聞常規 (routines) 處理 (Tuchman, 1973, 1978)，結合個人認知、機構制度及專業規範，是極其倚重常規的一種報導種類。因此，探討突發新聞的轉變，可反映新聞場域的外部力量變化如何導致新聞常規的變遷，有助追蹤記者慣習的改變。第二，警方轉用數碼通訊及媒體匯流的大勢，令香港突發新聞由九十年代中期的黃金期走到現今的衰落，³可供探索政經及科技因素如何令新聞場域在回歸後經歷劇變。第三，隨著傳播科技和社交媒體的一日千里，人人可成記者，在社媒上尋找消息來源及資訊變成新聞常規 (Moon & Hadley, 2014)，突發新聞正是其中之一 (Cheung & Wong, 2016)。本研究的目的有二，分別是探討科技變遷背景下香港報章突發新聞場域的變化，以及了解場域中行動者位置及慣習的改變。

文獻回顧

新聞場域

Bourdieu (2005, p. 30) 的場域理論沿襲 Weber 和 Durkheim 的看法 (Benson, 1999)，認為場域並非獨立自主、不受制約，而是半自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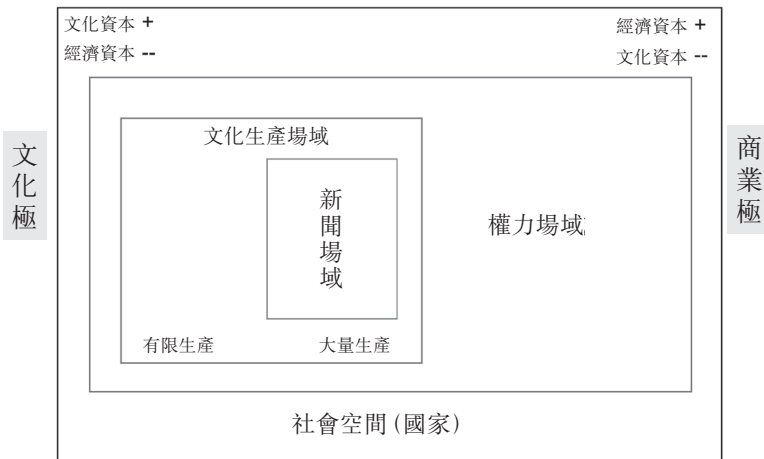
場域是一個集結不同力量的場域，內有不同的行動者 (agents) 佔據不同位置，佔位是一個持續的行為和過程，為的是維持或改變場域力量關係的結構，以維持或增加自己的優勢……場域是行動者作出行動和反應的領域，行動既是基於他們在場域中的經驗，也是他們對各種力量關係和結構的反應，他們建構、感知、解讀這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些關係和結構，形成一套想法。如此，他們既為各種力量規限，形成長久的屬性 (dispositions)，也在少許自由的條件之下，作出相應的行動和反應。

不同場域各有自己的邏輯和資本，行動者受場域內的權力關係和結構制約，他們的自主性視乎場域內他律 (heteronomy) 和自主 (autonomous) 的程度，限制越少則自主性越強；越受制於其他力量則自主性越低。此外，場域內有不同資本，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是最原始的，經濟資本泛指金錢或資產；文化資本則是指教育、知識、專業技術等；社會資本是社會網絡和人際關係的資產。另外，符號資本則是關乎合法性或認受性 (Benson, 2006; Bourdieu, 1998b)，在場域中資本可以轉換。Bourdieu 又提出兩個與文化資本相關的概念：文化仲裁 (cultural arbitrary) 和符號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Kvasny & Truex, 2000)。文化仲裁 (cultural arbitrary) 是指一些主導的階層提出和管理的一套文化準則，明示或暗示地決定了何種文化資本是有價值，涉及物質及符號資源的需求和再產生，屬於一種權力概念。符號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則賦予階級系統合法性，包括透過一些政策達至正規控制，或是法律以外的規範 (Kvasny & Truex, 2000)。

圖一 Benson (1999) 對 Bourdieu 權力場域及新聞場域的結構圖像解說



資料來源：黃順星 (2010 : 11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圖一呈現了 Benson (1999) 對 Bourdieu 有關他律和自主的結構圖像解說，在社會中最大的權力場域有左右兩端，分別是左極的文化權力及右極的經濟權力，越靠近左面的文化權力極，文化資本越多，經濟資本越少；反之，越靠近右面的經濟權力極，文化資本越少，經濟資本越多。大權力場域中有很多不同的場域，它們的他律和自主程度受制於兩種基本因素，第一是個別場域倚重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程度，這個因素亦決定了第二個因素，就是場域在大權力場域中的位置，場域越近左極，相對擁有越大學度的自主性；越近右極，越受經濟權力所影響，場域的他律性較高而自主性較低 (黃順星，2010；Benson, 1999; Hesmondhalgh, 2006, p. 215)。

根據 Bourdieu 和其他學者的意見，新聞作為一種場域，有數項特性，第一，新聞場域為大權力場的一部分，備受各種權力的角力影響，新聞的產製和內容正是權力關係的反映 (Schultz, 2007)；第二，新聞場域是文化生產場域的其中一部分 (Bourdieu, 1993; Schultz, 2007)，屬大量生產區域，相對靠近權力場域，較受經濟力量影響，他律性較高，自主性較低 (黃順星，2010；Benson, 1999, p. 465; Benson & Neveu, 2005)；第三，新聞工作者擁有不同的資本，文化資本是由新聞行業的倫理、意識形態及角色所構成 (Hanitzsch, 2007)，這種專業的文化資本亦令新聞可以成為一個具自主性的場域，得以對抗外在壓力；第四，在新聞場域中，一個新聞故事如何被選擇和撰寫，是基於記者/組織場域內的客觀結構性位置和主觀的「慣習」(habitus) 共同影響所致 (Benson, 1999, p. 467)。所謂「慣習」(habitus) 是一套主導行動者行為實踐的傾向系統，受行動者的社會經驗和客觀存在條件所塑造，形成傾向並內化，近乎本能地指導人們的感覺、實踐和對實踐的認知，是習慣的、實踐的、不需言明的行為準則 (Bourdieu, 1989; Bourdieu & Wacquant, 1992; Swartz, 1997)。

世界各地有不少研究證明 Bourdieu 的理論是適合分析媒體的理論框架，例如 Schultz (2007)、Hovden (2008) 及 Wiik (2010) 分別使用場域理論分析丹麥、挪威和瑞典的新聞行業。場域理論也提供分析工具以探討在新媒體環境之下的媒體及媒體實踐，以及新舊媒體之間的複雜關係 (Benson & Neveu, 2005; Willig, Walorp & Hartley, 2015)，並可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同時探討科技力量與其他力量的互動，以及行動者因應新科技作出的反應 (Hilgers & Mangez, 2015; Ignatow & Robinson, 2017; Zillien & Marr, 2013)。不過，在原來的場域理論中，科技力量的角色模糊，沒有釐清科技是否可以視為權力、場域還是資本。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發展，科技力量及其引發的社會變革影響巨大，有必要將科技力量作為單一重要因素考慮，是研究新聞場域時不可或缺的部分 (English, 2016)。因此，本文旨在透過探討突發新聞的個案，在理論層面補充科技力量在新聞場域中的多方面影響。下文將回顧及剖析科技與新聞發展的關係，繼而提出本研究的理論框架。

科技與新聞發展：危多於機？

影響傳媒發展的宏觀因素中，政治經濟一直是研究的焦點，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固然塑造了新聞產製的條件和內容，然而在流動互聯網年代，數碼媒體令資訊環境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科技逐漸成為催生新聞變革的主要力量之一 (Sussman, 1997)，科技與新聞工作者的個人因素、新聞機構特徵、市場壓力等因素交織，影響編採新聞的常規 (Klinenberg, 2005; Moon & Hadley, 2014; Shoemaker & Reese, 1996; Singer, 2003, 2004)。綜合來說，科技對新聞媒體有至少五方面的影響：

新聞的產製。網絡新聞強調互動和多媒體等元素，網絡和社交網站作為新聞傳遞的平台，令新聞產生形式和內容的質變 (Boczkowski, 2004; Boczkowski & Ferris, 2005; Carlson, 2003; Gleason, 2010)，同時為新聞專業帶來衝擊，有研究認為守門人的功能會因此消滅 (Domingo et al., 2008)。

消息的發放和內容。科技改變了信息的傳遞，面對轉變，新聞工作者角色被動，例如，數碼科技為香港政府提供機會，透過更新警方通訊技術，杜絕記者直接聽取通訊內容，操控突發新聞消息的發放，令突發新聞的採訪變得困難 (Cheung & Wong, 2016)。不過，社交媒體也成為重要的新聞來源，監察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體成為新聞常規 (Bastos, 2015; Schifferes, et al., 201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報業經濟模式和市場。在面對讀者和廣告萎縮的情況下，科技的衝擊加速傳統新聞媒體的變化(Edmonds, 2013; Lowrey, 2012; Tandoc & Jenkins, 2017)。媒體匯流對報章可能是機遇(黃天賜, 2013; Kilman, 2015)，但媒體「轉型」需要大量經濟資本的投入，並非所有報章可以「轉型」成功，舉例來說，英國2018年的地區和地方報紙比2005年減少了近200種(Elgot, 2018; McLennan & Miles, 2018)。

另類競爭。首先，網絡媒體成為傳統媒體的競爭對手，例如美國的*The Huffington Post*、香港的《香港獨立媒體》、《香港01》、《立場新聞》都是在網上出版的獨立媒體。其二是公民新聞的崛起，打破了傳統新聞媒體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取而代之的是「人人都是記者」的概念，令到新聞出現去專業化的情況(Splichal & Dahlgren, 2016; Tandoc & Jenkins, 2017)。

後真相意識形態。在社媒年代，過往新聞媒體推崇的事實性報導和客觀性報導飽受衝擊，新聞的實踐逐漸呈現後真相意識形態帶來的變化，有學者指出新聞真相已經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另類事實，社會亦進入了所謂的「後真相」年代(Corner, 2017; Himma-Kadakas, 2017)。Sales (2017)指出，處於「後真相」社會中，個人觀點和情感有時比客觀事實更具影響、更受歡迎，因為社會大眾往往更偏好這種混入了意見的真相(Fuller, 2018, p. 4; Martin, 2017)。

綜合上述各點，科技對新聞傳媒來說，似是危多於機，影響新聞的內容、形式及專業。Kvasny及Truex (2000)曾探討如何將場域理論應用在研究資訊科技之上，認為可以將資訊科技視為一種文化產品，而權力關係會促成應用資訊科技的模式、格局和限制。此外，有學者嘗試研究新媒體和科技如何改變新聞場域，例如Siapera及Spyridou (2012)探討網上科技如何削減新聞專業的文化權力，影響新聞場域的自主性；Tandoc及Jenkins (2017)研究傳統媒體如何解讀和接受Buzzfeed新聞網站；Serban (2017)則探討香港新聞傳媒工作者如何在科技匯流、公眾參與、政治經濟因素下履行專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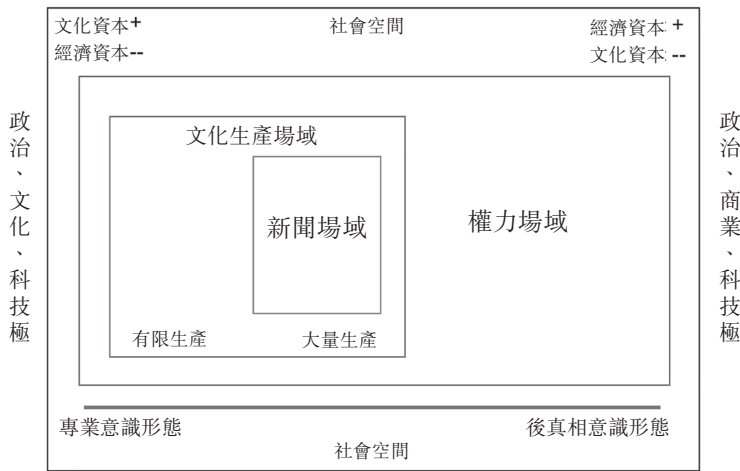
有學者指新聞產製不是由單一元素影響，而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互動構成(Adoni & Mane, 1984; Neuman, Just & Crigler, 1992)，科技力量在大權力場中的影響，已超越單一模式，在本研究中，科技既是構成大權力場的背景元素之一，科技邏輯同時影響社會的意識形態；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各種力量又與科技互動交織，發揮影響；此外，科技亦是不同行動者可用的一種技術手段。

Benson 考慮到國家對新聞場域的多方面影響，在原有的場域理論上，提出把國家的力量加在場域結構框架左右兩極，分別是國家文化公民權力極及國家市場權力極 (2006, p. 194)。本文建基於 Benson (2006) 對場域理論模型的補充 (黃順星, 2010)，提出圖二的補充框架，以更充分表達科技與其他力量的交織。

圖二 本研究就大權力場域及新聞場域結構的補充



註：建基於 Benson (2006) 及黃順星 (2010) 對場域理論模型的補充

圖中科技力量如同政治權力一般，置於大權力場的兩極，一方面出現在右極，與國家政治和經濟權力交織，對社會上的各場域 (包括新聞場域) 有支配性的影響；另一方面科技力量體現在左極，簡單易用的傳播科技手段和平台，網路傳播社會的連結特性，有利文化力量的發展。圖下方的意識形態軸，新聞場域越近右極越趨後真相意識形態，文化資本低，越近左極，則越偏重專業。

由盛轉衰的突發新聞

本研究中，突發新聞被界定為對犯罪事件及意外的報導，屬於每日均會發生的新聞，是極其倚重「常規」的一種新聞種類。Shoemaker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及Reese (1996)把「常規」定義為「傳媒業者所套用、重複有規格化的工作習慣及模式」。根據場域理論，突發新聞是一種文化產品，包含了新聞場域的兩種對抗性元素，一種是新聞專業；另一種是煽情內容(Bourdieu, 1998a, p. 70)，這兩個元素各有其合法性原則，一方面是同業所認同、內化的價值和場域的專業原則；另一方面是大眾的認同，以讀者數量和盈利來衡量。香港回歸初期正值突發新聞的蓬勃時期，新聞產製更重視商業邏輯，市場掛帥，突發新聞成為吸引讀者的重要產品，報館投入大量的經濟資本進行突發新聞採訪，突發新聞的報導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提升，常常佔據報章的頭版及其他重要版面。所以在這一時期，突發新聞最受經濟資本和商業邏輯的影響，他律性較強，商業價值較高，文化價值較低。然而，隨網上新聞日漸盛行，報章市場開始萎縮，突發新聞更要面對官方消息來源變動的挑戰。Gans (1979)指出，新聞消息來源對媒體內容有巨大影響，在發掘新聞素材及內容建構的環節十分重要，新聞的專業價值及時間限制都推使記者依賴官方消息(Shehata, 2010)。Bourdieu (1998a, p. 69)認為在政治權力對新聞的壓力方面，政府最能透過壟斷官方消息來源影響新聞媒體。自1997年回歸成立特別行政區以來，香港經歷中港融合的過程，此後政府一直嘗試增加對傳媒的規管(HKJA, 2010; Chan & Lee, 2007)。香港記者近年對政府的不滿之一，就是官方完全控制了新聞消息發放的渠道(HKJA, 2007, 2010, 2012)。本文就突發新聞的研究，以警方和消防轉用數碼通訊的措施為焦點，探索突發新聞記者如何在這樣的轉變下，改變慣習，影響專業。

警方和消防是發布罪案及意外消息的官方機構，是突發新聞場域中重要的行動者。此二者決定了警方和消防數碼通訊系統的模式，和對傳媒發放罪案和意外消息的政策和機制。根據Cheung及Wong (2016)的一項研究總結，世界各地的警方在轉換成為數碼通訊系統時，對傳媒的資訊發放，大致採用了三種模式。第一，有些執法機關採用沒有加密的數碼電台通訊，容許傳媒以數碼器材收聽警方通訊(Capitol Hill Monitors, 2000)。第二，有些地方的警方批准傳媒收聽警方的加密通訊。在這兩種情況之下，記者均擁有即時收聽警方通訊的權利，與以往沒有數碼通訊的情況無異。不過在第三種情況之下，一些警方不容許傳媒直接收聽警方通訊，而選擇在網上平台向傳媒發放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有關罪案和意外的資料，並通過警方的公共關係部門提供資訊。這種模式下，警方可以完全操控有關資訊的發放，新聞傳媒角色被動。香港警方和消防選擇採用第三種模式，此舉限制了罪案及意外相關資訊的流通。因此，本文設立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警方和消防的通訊科技變化如何改變香港突發新聞工作者的「慣習」與新聞實踐？如何改變突發新聞的內容？如何改變突發新聞的專業實踐和場域？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突發新聞都受著科技因素的影響，社交媒體成為報章重要的新聞發掘和發布渠道 (Bastos, 2015；Hermida, 2016；Thurman & Newman, 2014)，科技改變了罪案和意外消息的發放和接收，人們現在不需要透過大眾媒體，便可以從社交媒體或個人通訊平台，獲得相關消息。Cheung 及 Wong (2016) 發現，隨著香港警方和消防將通訊轉為數碼化之後，社交媒體成為報章發掘突發新聞消息的一個重要平台及記者的重要消息來源。因此，本文的另一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二：突發新聞記者作為個體行動者如何重建新聞「常規」？如何利用科技和社交網絡突破政府制度化的資訊限制？如何爭取突發新聞記者的主動性和維持專業性？

本研究透過了解在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出現怎樣的變化，並探討機構和記者如何與政府官方和科技力量互動。

研究方法

本研究亦會採用突發新聞記者的深度訪談和突發新聞的量化內容分析，下文將介紹深度訪談和內容分析方法的設計。

深度訪談

Schultz (2007) 指出，編輯或記者在場域理論之中是行動者，本研究就警方和消防轉換數碼通訊前後的突發新聞變化，依據下列開放式問題對新聞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1. 回歸後的突發新聞採訪報導有何改變？
2. 上述改變的最重要原因是什麼？(請提出及解釋，並提供例子)
3. 警方及消防轉換數碼系統，對突發新聞的採訪有何影響？
4. 針對新的通訊機制，突發新聞記者有何應對策略？
5. 政治、經濟、科技等對突發新聞的採訪報導有何影響？
6. 總體來說，突發新聞的專業有何變化？

本研究採用關係性抽樣，針對地選擇訪談對象，分別訪談不同新聞組織的高層管理(如總編輯、副總編輯、助理總編輯等)、中層管理(如採訪主任、組長等)及前線工作者(首席記者、高級記者、記者)，為問題提供全面的解釋，並了解不同層級就慣習和專業準則的異同。本研究共訪問了15位資深突發新聞工作者，他們的年資均在15年或以上。訪問由2016年10月至2018年2月期間進行，訪問時間由45分鐘至86分鐘不等，所有訪問內容皆有錄音並撰成對白，內文的引述皆以匿名編碼取代受訪者身份(A：大眾報突發新聞工作者；B：資訊報突發新聞工作者；C：黨報突發新聞工作者)(見附錄)。

內容分析

本研究以量化內容分析的方法將報章的突發新聞進行分析，以便有系統地統計與描述各報在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的報導數量、消息來源、表達手法和圖片使用等情況。

選取樣本：本研究的量化內容分析在三個發展階段中，各選取一個時段的突發新聞作比較，分別是：

1. 第一階段2002年2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⁴
2. 第二階段2012年2月1日至2013年1月31日；⁵及
3. 第三階段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⁶

目前香港出版的收費中文日報共十份，C. C. Lee (1998)認為香港的日報大致可分為三類：中國官方在港辦的三份報章(下稱黨報)⁷、資訊性報章⁸和大眾化報章⁹，三種報章在突發新聞的編採策略上均有不同，黨報既為官辦，對市場依賴較少，吸引讀者和廣告的壓力也相對較少，對突發新聞相對較不重視；資訊報比黨報有較多的突發新聞，但仍以政經新聞為重；大眾報最依賴突發新聞招徠讀者和刺激銷路，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因此突發新聞比重最多 (Cheung & Wong, 2016)。為較能反映報章整體的變化，本研究以「分層隨機抽樣」(Cluster random sampling) 分別選取各類別中的一份進行分析，分別為《蘋果日報》、《明報》和《文匯報》。根據Tuchman (1973) 的意見，基於意外事件突然發生的性質，突發新聞的發生不會隨日子而改變，因此本研究隨機選取了每月雙數週的星期二作為突發新聞的抽樣樣本。換言之，本研究選取了上述三份報章在以上三個階段中，每個月的雙數週(第二週和第四週)的星期二中所有突發新聞故事作為樣本，突發新聞故事定義為所有罪案或意外新聞的報導，跟進報導及評論報導不包括其中。分析單位為一宗新聞故事，如果一宗故事有三篇報導，仍屬同一宗故事。樣本合共有1,444篇新聞報導(2002年659篇；2012年524篇；2015年261篇)。

分析項目：研究的量化內容分析將以新聞故事為單位，建基相關研究的項目之上，¹⁰ 本研究分析下列突發新聞的項目：

1. 報章：新聞故事來自何份報章；
2. 版面：新聞故事刊出的版面；
3. 字數：新聞故事的總字數；
4. 新聞種類：新聞故事屬於罪案新聞還是意外新聞；
5. 受害人/傷者消息來源：新聞故事有否包含受害人/傷者消息；
6. 目擊者消息來源：新聞故事有否包含目擊者消息；
7. 新聞圖片數量：新聞故事中包括的所有圖片數量；
8. 顯示死傷者的現場圖片數量：故事中有顯示傷者/死者的現場圖片數量。

本研究抽取其中三分之一時段(24天)的報導編碼，並計算編碼可靠度 (intercoder reliability)，各項目的Kappa值達80%以上(表一)。

表一 突發新聞內容分析編碼可靠度的計算結果

編碼項目	Kappa 值
新聞種類	.982
受害人/傷者消息來源	.915
目擊者消息來源	.892
新聞圖片數量	1
顯示傷者/死者的現場圖片數量	.888

註： $p \leq .00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結果

本章節主要綜合深度訪談和量化內容分析的結果回答研究問題一和二，探討科技力量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新聞場域，如何與政治經濟力量互動，導致作為文化產品的突發新聞產生變化，並了解這些變化怎樣改變機構的應對策略、記者的慣習。

政府利用科技重塑場域規則

警方操控機制壟斷資源。香港警方和消防作為在大權力場中的強大機構行動者，在應用數碼通訊科技時，最終選擇最不利新聞傳媒的一種方法，把記者拒諸門外，不容許傳媒收聽通訊內容，而是透過網上平台發放不實時的罪案或意外消息，記者需要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才獲得事件進一步資料。所有受訪者均表示，現有機制使記者失去以往作業優勢，警方使用科技結合制度性的做法，令新聞機構行動者及記者個人行動者重置於場域中的不利位置，根本性地削弱了新聞傳媒的資訊資源，控制了突發新聞的資訊。受訪者指出，警方和消防通訊數碼化前，記者透過收聽警方和消防的通訊，基本已可以全面收聽有關罪案及意外的內容，令記者從中發掘新聞，決定哪些事件具有新聞價值值得跟進，哪些事件是重要新聞需要加調人手採訪，亦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獲得第一手消息和圖片(A4、A7)。受訪者慨嘆通訊數碼化杜絕他們從源頭直接獲得罪案和意外的資訊，記者無法再直接聽通訊內容，只能等官方發布，令他們感到蒙在鼓裏(A2、A4、C15)，跟從前的作業方式形成對比：

完全是對比，以前我們什麼都知道，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什麼、什麼時候才知道、是否會知道，都由警方控制，他們選擇不講、延遲講、選擇性地講，都是由他們控制。(B13)

Kvasny及Truex(2000)又指出，「符號暴力」亦可以透過科技的使用，推動一些新規範(norms)的形成，以作非正式的控制文化生產。有記者表示，要和警方保持良好關係，「單靠官方正路『常規』資料是不成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的，要靠私下關係」(A1)，才可以在制度以外獲得有關突發新聞的資料或線索。透過使用「符號暴力」，警方可以重新塑造新聞場域中機構行動者的位置，為爭取警方在罪案和意外方面的消息，一些報館會拉近與警方的距離，相應地在報導上作出一些變化，例如「減少批評警方的做法」(A6)，而一些與警方關係相對一般的新聞媒體，在場域中的位置所獲得的突發新聞資源相對薄弱，不利與同業競爭，因為「對手獲得較多警方消息，有時有獨家新聞」(A2)。

警方扮演「文化仲裁」角色。根據Kvasny及Truex(2000)，一個場域的自主程度其中一個決定因素，是場域可否獨立地建立或擁有一套文化的判斷準則，令這套準則具合法性。在突發新聞的個案中，突發記者原本有他們一套判斷的準則，決定報導或不報導一宗事件。然而，警方和消防使用數碼通訊科技，引入新的資訊發放機制之後，警方成了資訊的擁有者和把關者，決定了什麼事件可以有機會成為新聞，資訊發放是根據警方的準則，而不是記者的專業準則。有受訪的高層慨嘆警方把他們的規範加諸於新聞界(B9)。綜合記者們的意見，警方在發放資訊方面出現兩種狀況，一是延誤簡化消息發放；二是警方過度篩選消息，讓記者不能執行意外和罪惡消息的傳遞這個文化生產者的角色。所有受訪者均指現時機制延誤罪案和意外事故消息的發布，資訊亦過於簡單，令新聞採訪困難：

【警方和消防】消息發放遲，一般遲幾小時，最少也遲半小時，去到現場時，所有涉事的人都已離開，可能只有一架爛車，有時甚至連車都被拖走了，那還有什麼可以拍攝？還要不要採訪下去？
(A2)

所有受訪者均認同突發新聞的數量下降，包括了他們每日處理的新聞數量，及每日見報的報導數量。本研究的量化內容分析結果檢證了受訪者的觀察，在樣本中(見表二)，突發新聞的數量在警方和消防通訊數碼化後持續下降，2002年數碼化通訊系統轉換前，三份報章在抽樣的時段共有659宗突發新聞報導。2012年系統轉換完成後的這段時期，是官方和傳媒就新機制的磨合期，傳媒常常投訴警方和消防發布消息不足、時間延誤，三份報章在抽樣時段共有524宗突發新聞報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導，較未轉換系統之前數量下降；2015年，即系統轉換後的第三年，理論上官方和傳媒就新機制的磨合期已經完成，發放機制和頻率應該趨向穩定，不過數據顯示這一年的樣本，三份報章只有261宗突發新聞報導，相比未作系統轉換之前2002年的階段，跌幅超過一半，其中以大眾報《蘋果日報》跌幅最大，達67.7%，資訊報《明報》下跌58.4%，黨報《文匯報》下跌32.6%，數字顯示越依賴突發新聞的報章類型，新聞數量的跌幅越嚴重。

表二 2002、2012及2015年的突發新聞樣本數量

	突發新聞數量			總數	
	《蘋果日報》	《明報》	《文匯報》		
年份	2002	378	195	86	659
	2012	271	155	98	524
	2015	122	81	58	261
總數		771	431	242	1,444

此外，受訪者亦投訴警方和消防對罪案和意外事故消息進行篩選，指警方不會發布所有消息，「最初轉制時發放消息極少，我印象中一日不足十宗，是以往的二十分之一」(A3)。後來經新聞傳媒連番投訴之後，發布消息增多，不過「多是新聞價值很低，沒有用的，報館不會刊登的事故」(C15)。有突發組高層表示，警方和消防篩選機制並不清晰，不過審查是明顯的，受訪者指警方會以私隱或妨礙案件調查為理由，傾向不發布某些罪案事件消息，例如風化案(A1、C14)，「某些種類的新聞少了，特別是罪案新聞，比以前少」(B9)。

受訪者的觀察與量化內容的卡方分析(Chi-square test)結果一致，2002、2012及2015年三個時段中的罪案和意外新聞數量有顯著分別 $\chi^2(2, N = 1,444) = 55.86, p < .001$ (表三)，在2002年的樣本中，罪案突發新聞的數量為453宗，比例約佔70%，意外新聞為206宗，佔約三成；在通訊數碼化後，2012年罪案新聞的比例下降至約六成，共324宗，而意外新聞則上升至近四成；及至2015年，罪案新聞的比例下降至四成，只有110宗，而意外新聞則上升至近六成。數據顯示罪案新聞的比例持續下降，而意外新聞的比例卻上升。另一方面，卡方分析(Chi-square test)顯示三份報章在2012及2015年的罪案和意外新聞比例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表三 時段(2002、2012及2015年)和新聞類別(罪案/意外新聞)的交叉表(Crosstabulation)

	新聞類別		χ^2
	罪案	意外	
2002年	453	206	55.86***
2012年	324	200	
2015年	110	151	

註：*** $p \leq .001$

並無顯著分別，反映不同類型報章在通訊數碼化後均減少了罪案新聞的比例。

新機制不利記者專業實踐。在警方和消防使用數碼通訊之前，記者可以獲得充分資訊，在突發新聞的採訪和報導方面作多方面的專業判斷，知道事故發生時，他們可以判斷事件是否值得報導，在現場可以判斷誰是目擊者，根據現場尚有的證據，判斷怎樣訪問在場的警員，判斷怎樣拍攝現場圖片，以大量新聞圖像還原事實(B8)。現時的機制對記者的專業實踐造成困難，「網上提供的資料太有限，有時候去到現場，才發現只是輕微事故，沒有新聞價值」(C14)。記者有時候去到現場，環境證物和目擊者都沒有了，很難作出判斷如何跟進採訪，更難拍得好照片(B5)。受訪者指出，現在記者失去自主，記者角色「可以用被動去形容，變成好被動，所有資料都要等。」(A3)記者在新聞採訪中的主導性和自主度減低了，失去場域中的有利位置，被迫更依賴政府的權力機構。

重拾場域據點的應對策略

Kvasny及Truex(2000, p. 289)指出，行動者為避免在新科技的應用過程中被奪去位置，要想辦法建立不同的應對策略。受訪者同時指在新機制下，報館機構和記者亦採取了不同應對策略。

機構削減突發新聞。面對通訊數碼化和新機制的挑戰，報館機構作為新聞場域的重要行動者，需要作出被動或主動的反應，報館曾派出代表與警方和消防磋商，游說官方改變現有機制(A7)。有受訪者指出，在新機制之下要做好突發新聞，需要更多人力。然而，面對報章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市場日漸萎縮，新聞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對讀者的吸引力轉弱，轉化成為經濟資本的能力下降，「老闆對再投入資源在突發新聞上有審慎的考慮」(B9)，老闆不願意再大量投資，不少受訪者甚至指他們的機構削減了突發記者的人手，由20%到一半不等(A1、A4、A5、B8)，有受訪者感嘆：

現在不景氣，報章本身已經銷量低，突發新聞又不如以往一樣能吸引讀者，因為轉了通信系統之後，大新聞少了很多，商人投資的傳媒，說到底還是要賺錢，既然突發新聞不如以往般有價值，那自然不會繼續投資下去。(A7)

報館高層在衡量突發新聞和其他新聞的價值後，往往會把報章版面重新安排，減少突發新聞的版面，將版面留給其他更吸引讀者的新聞產品(A7)。此外，他們亦會調整突發新聞的策略，把採訪突發性即時新聞的人數比例減低(B8)，寧可調撥人手在網上發掘新聞消息，減少成本(A1、A2)。

行動者的應變策略。突發記者因應新機制有不同的應對策略。首先，制定新的作業規範和流程，受訪者指新系統出現之初令他們束手無策，「很被動，後來慢慢摸索方法，自然有一套方法去適應、去做。」(A3)隨著時間，業界找到一套判斷方式，「去處理，去查詢，試下試下，有些有效就繼續用。」(A3)此外，某些報館的記者會結成聯盟，互通消息，分工去現場採訪，知會其他盟友。(C15)

為了爭取主動權，記者會發掘其他罪案和意外事故的消息渠道，利用新的資訊科技，吸引讀者提供資料，或在網上社交平台發掘資料，進行採訪。有些報章設有專線，如讀者提供照片或影片，都會有報酬(A3)，有報章「每日最少會用一條讀者消息」(A4)，因為「現在市民人人有一部手機，有時他們第一時間在場，比警察更快。」(A3)

此外，社交媒體對記者的專業實踐變得非常重要，受訪者指社交媒體如Facebook有不少群組可以提供資料(B10)，新聞界利用這些流動性社群，獲得重要線索，知道事件的情況和嚴重性，判斷是否採訪，甚至直接取片報導(A4)。有受訪者表示他們每日都會持續瀏覽一些Facebook群組，監察社交媒體可補充因為警方新機制而無法或減少取得的資訊，包括照片及目擊者消息：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那些人把照片或影片發布在Facebook，如果是他們自己拍攝的，他們即是第一身目擊事件發生，那麼我們會叫他們講一下現場的情況。現時我們往往去到事發現場已經找不到目擊者，反而這些群組可以幫我們找到一些目擊者。(C14)

記者甚至要加入群組，方便聯絡發放消息的人，「與報消息的人閒聊，當作現場第一身訪問」(A3)，以互聯網的運作邏輯來進行新聞採訪。記者以往的作業常規最重要是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取得第一手照片，採訪目擊者，但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年代，他們的作業常規改變了(B12)。警方和消防轉換數碼化通訊，對突發新聞造成影響，但記者利用科技，又可以對突發新聞的採訪帶來好處，有受訪者表示社交媒體「拯救了突發新聞」(A2)。

服膺科技邏輯。科技對突發新聞來說有利也有弊。綜合受訪者的意見，科技對他們的挑戰主要有四方面。第一，在互聯網年代的社會中，如果發布新聞的速度較其他同業慢，讀者可能放棄閱讀。由於要盡快上載新聞到社交媒體，記者的壓力增加，他們必須在極有限的時間內盡快成稿上載，有時甚至只能作有限度的資料核證(A4、A5、B8)。第二，雖然記者從社交媒體獲得照片、影片及目擊者消息，不過社交媒體的資訊對記者來說也有潛在危機，「要怎樣去用去判斷就要看記者的功力，要小心，單憑一張照片，沒有前因後果……很容易出錯。」(A7)第三，網上媒體講求點擊率，此一指標甚至決定一些新聞故事是否值得跟進採訪，「很多時都是看一宗新聞的點擊率再決定做多大」(A3、A5、A7)，網民的意見亦會影響記者報導新聞。因為很多時候網民都會在社交媒體上批評記者的報導，所以記者往往在寫新聞時會估計網民有可能的反應(B12)。第四，獨家新聞變得困難罕有。Bourdieu (1998a) 指出新聞產品的競爭，是爭奪最新的新聞或獨家新聞(p. 73)，社交媒體的盛行令人人都是記者，可以秒速轉發資訊，限制了記者獲得獨家新聞的機會，「當我們在多於一個群組見到同一張照片，就知道沒有獨家了」(A7)。

為了適應科技邏輯，新聞機構有時甚至犧牲新聞場域的專業邏輯。社交媒體的邏輯不但影響新聞的選題、報導規模和跟進、報導速度、核實的質素，甚至影響了標題和內容的選詞用字(B8)。受訪者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出，報館用社交媒體的資訊，或多或少與經濟原因有關，「人手短缺，就自然取易不取難，在網上見到有消息，查證的功夫不夠也直接報導」(B8)，受訪者亦指出現在傳媒行業萎縮，報館會傾向編排人手專門負責監察社交媒體，減少外出採訪的人力(C15)。在有限的經濟和人力資源之下，在社交媒體找尋新聞源頭和資訊是大勢所趨，服膺互聯網的邏輯也是無可厚非。

被削弱的文化產品

訪談和內容分析的結果顯示，突發新聞作為一種場域內的文化產品，內涵、價值和競爭力均為削弱。

新聞質量改變。訪談的結果顯示，突發新聞在警方實施數碼化通訊之後失去許多重要的新聞元素，無法維持其質量和吸引力。通訊數碼化之前記者可以有較大機會接觸並採訪傷者或目擊者，現在則欠缺資訊，加上延誤發布，能接觸到這些重要消息來源的機會少了(A3、A7)。新聞內容的卡方分析(Chi-square test)結果顯示，在三段時期中引述傷者或目擊者消息之新聞故事數量和比例均有顯著變化(表四和表五)。在引用受害人/傷者消息的新聞數量方面，2002、2012及2015年三個時段有顯著分別 $\chi^2(2, N = 1,444) = 9.54, p < .01$ (表四)，2002年有引用受害人/傷者消息的新聞數量及百分比是117宗(17.8%)，2012年輕微下降至83宗(15.8%)，2015年則大幅下降至25宗(9.6%)，在新聞報導中能夠引述受害人或傷者的比例不足一成。而卡方分析(Chi-square test)顯示三份報章在引述傷者或目擊者消息方面並無顯著分別，趨勢類同。

另一方面，卡方分析(Chi-square test)結果顯示，2002、2012及2015年三個時段的新聞報導在引用目擊者消息方面分別顯著 $\chi^2(2, N = 1,442) = 15.43, p < .001$ (表五)，2002年有引用的報導是144宗(21.9%)，2012年下降至69宗(13.2%)，2015年只有25宗(16.5%)。卡方分析(Chi-square test)則顯示三份報章在引述目擊者消息方面亦無顯著分別，反映不同類型報章在通訊數碼化後在目擊者消息引述上跌勢相若。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表四 時段(2002、2012及2015年)和引用受害人/傷者消息的新聞數量(引用/不引用)的交叉表(Crosstabulation)

	引用受害人/傷者消息新聞數量		χ^2
	沒有引用	有引用	
2002年	542	117	9.54*
2012年	441	83	
2015年	236	25	

註：* $p \leq .01$

表五 時段(2002、2012及2015年)和引用目擊者消息的新聞數量(引用/不引用)的交叉表(Crosstabulation)

	引用目擊者消息新聞數量		χ^2
	沒有引用	有引用	
2002年	514	144	15.43*
2012年	454	69	
2015年	218	43	

註：* $p \leq .001$

突發新聞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現場照片，以前突發記者可以透過警方通訊第一時間同步聽到消息，即時派人趕赴現場採訪，「有機會快過警員到場，拍到第一時間的照片。」(A5)新通訊系統令有質素的現場照片少了，新聞欠缺吸引力，「你去到『現場』，基本重要的人和物都沒有了，傷者也拍攝不到，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拍到好的照片。」(A3)在三時段的報導樣本中，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結果反映照片的平均數量($F = 8.16, p < .001$)和攝得現場死者/傷者照片的平均數量($F = 32.01, p < .001$)均有顯著不同(表六)，2002年的照片平均數量是1.32張；2012年的平均數量下降至1.09張；2015年回升至平均1.33張，2012年的照片數量比2002年和2015年顯著少。此外，現場死者/傷者照片的平均數在2002年的樣本中是0.45張，比之後兩時段顯著多；2012年的平均數量銳減至只有0.19張；2015年輕微回升至平均0.26張。數據顯示，採用數碼通訊之後，2012年突發新聞的照片量最少，至2015年則有回升趨勢。受訪者提及，記者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找到較多的照片和影片，彌補了機制帶來的影響，只不過是記者作業的模式改變了，由趕赴現場攝得照片，變成要在互聯網上找尋照片。至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表六 照片平均數量及現場死者/傷者照片的平均數量在三時段(2002、2012及2015年)中的平均值(Mean)和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三時段		
	2002年	2012年	2015年
照片	1.32 _b (1.10)	1.09 _a (1.02)	1.33 _b (1.11)
現場死者/傷者照片	0.45 _b (0.66)	0.19 _a (0.45)	0.26 _a (0.56)

註：括號內數值為標準差(SD)，根據Tukey post hoc分析，平均值顯著不同將以不同的subscripts代表($p \leq .001$)

於報章差異方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結果反映三份報章在兩項照片變量上並沒有顯著不同。

上述三段時期的新聞內容分析，顯示2012年(警方及消防完成數碼通訊系統轉換後首年)及2015年(系統轉換後第三年)的突發新聞在消息引用和圖片使用上與2002年(系統轉換前一年)有所不同，顯示在科技變遷的背景下，新聞產品呈現質量的變化。然而，技術本身並不足以解釋突發新聞生產的改變，上述訪談結果發現，在數碼技術提供的種種可能性中，香港警方充分利用了技術對信息的控制，直接促使突發新聞生產常規突變。同時，受訪者也指出報紙市場萎縮也令新聞機構減少投入資源，記者人手緊絀，也可能迫使記者新聞實踐(journalism practice)的改變，導致了突發新聞產量與內容的變化。

後真相的新聞資訊。場域的改變令記者較難獲得全面的突發新聞資訊，隨著來自傷者或目擊者的第一手消息減少，取而代之往往是現場零碎的二手消息，以及網上獲取的零散資訊，經記者組織成新聞報導，有受訪者慨嘆：「今時今日的突發新聞，也不知是否能稱得上是新聞了」(B11)。綜合受訪者意見，現在的突發新聞資訊的數項特徵，呈現了後真相年代的特點。

第一是零碎滾動的「事實」。受訪者指出，由於警方提供的消息非常簡單，要完成一篇報導需要大量的跟進工作，然而報章要兼顧網上新聞，為了不被競爭對手搶先，就算報導內容非常單薄，只得寥寥幾句也湊合成篇，倉卒上載。其後獲得其他資訊時，會在原稿加上一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兩句新消息，重複度高，資訊性少 (B12)，「不斷更新，少許新材料都會更新一篇稿，零零碎碎，斷斷續續，這與我們以往只是做報章新聞的做法非常不同」(A6)。有受訪者表示，網上報導常會有遺漏，於是就再出補充稿，受訪者形容這是新聞「前傳」(A7)。這些碎片式報導、滾動事實，以及新聞前傳等等，都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年代新聞的特徵。

第二是混入情感意見的「真相」。受訪者指出，新聞的消息非常依靠網上的社交網絡平台，這些消息自然會受社交網絡內容形態所規範，網民上載有關意外或罪案消息時，很多時會滲入個人的情感和意見，甚至有時候是情感和意見多於事實 (B8)。另一方面，記者是否會跟進或如何跟進一宗突發新聞往往會受網民的意見影響：

好多時候網民的意見或者情緒反應都可以獨立成稿，你不去寫你不引用，也會有別的報館用，久而久之，個個都是那樣做，慢慢成為慣例。(A5)

專業實踐慣習改變，使另類事實透過記者採集和處理社交媒體上的資訊，進入突發新聞報導的場域之中，成為真相的一部分。當記者採用了這些另類事實，就象徵行業接納和肯定了這些意見和情感成為「另類事實」的正當性 (A1)。

第三，不是新聞的新聞。受訪者表示，在社交媒體的年代，一些記者以往覺得不是新聞，或者不像新聞，甚至根本是假新聞的新聞，也進入了新聞場域，原因是網上世界的大眾對新聞資訊的定義改變了。受訪者指出，現在網民都覺得拿著手提電話就可變成記者，將自己的主觀情緒放入新聞，他們不受新聞專業規範約束，覺得「有片有真相，有圖有真相」(B12)。當這些圖片及影片得到大量網民注意或留言，記者自然要跟進，但這些未必全部都是新聞 (A3)，受訪者感嘆新聞變質了 (B11、B12)，認為社交媒體年代的突發新聞，被挑戰的不只是專業實踐，更是專業操守，假若失去底線，便是真正的「新聞已死」(A1)。

結論及局限

Bourdieu 指出科技是構成社會大權力場背景元素之一，傳播科技的急速發展推動整體社會變化；同時，科技邏輯影響社會的意識形態，社會進入後真相年代，資訊的供、求、質、量，均被改變。在這樣的場域背景變遷之下，科技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互動，在場域內發揮不同的影響，本文的理論框架便是將科技上述不同層次的作用納入考慮。在科技變遷的場域背景之下，科技手段被不同行動者以不同的方法運用，本文提出兩條研究問題正是探討官方和記者如何因著科技的運用而被充權或制約，繼而改變了新聞實踐和內容，以致推動新聞場域改變。

研究問題一探討官方通訊科技變化如何改變了香港突發新聞工作者的「慣習」、新聞內容及新聞場域。本研究發現，回歸之後，科技和政治經濟力量均影響了突發新聞的場域，令新聞專業受到威脅。Bourdieu (1998a, p. 41) 說如果要知道記者能說什麼、寫什麼、什麼是有價值，就必須要知道記者在這場域中的位置。原本記者在新聞場域中，在發掘和採訪新聞方面佔據主導和有利位置，在這位置上作出專業判斷，是文化仲裁者，決定什麼事故值得成為新聞。然而這樣的優勢，在今天的新聞場域已是蕩然無存，政治力量使用科技力量行使「符號暴力」，掌控了突發事故的消息，掌控了記者的專業資本。技術的控制令警方在突發新聞的場域佔據有利位置，設定場域的遊戲規則，擔任了「文化仲裁」的角色，將他們對新聞的判斷準則加諸記者，甚至社會大眾之上。

新機制剛推行時，記者在新聞場域中失去有利位置，須在重整作業常規上摸索，籌謀應對策略，包括依靠讀者消息、到醫院守候、結盟等等。不過，無論受訪者的訪問或是量化的新聞內容分析，均顯示突發新聞的數量、內容和重要性均降低，不論報章類型，變化相若，顯示行業整體經歷類同的改變和挑戰。

研究問題二探討突發新聞記者作為個體行動者如何重建新聞「常規」，如何利用科技和社交網絡突破政府制度化的資訊限制？如何爭取突發新聞記者的主動性和維持專業性？對於突發新聞場域而言，科技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的影響是兩極。上述所言，政治力量結合科技力量箝制傳媒的資訊資本；科技力量驅使經濟力量追捧點擊率，兩者皆令記者的作業常規受根本性的打擊。但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科技力量又讓記者可以在政治力量的箝制下，找到另外一條通往新聞消息的道路，發展了一套依附社交媒體的工作常規，有受訪者形容社交媒體的消息拯救了突發新聞。不過這條「救命索」就把突發新聞的採訪報導拉向社交媒體的常規，採訪和報導越來越服膺科技邏輯，新聞發布消息的節奏、形式和內容都慢慢與社交媒體的遊戲規則接軌，透過新聞實踐，接納和間接肯定了意見和情感作為另類事實的正當性，突發新聞出現後真相的面貌，新聞事實變得破碎凌亂，情感意見不但左右記者的事實報導，更加入報導之中，變成事實的一部分。

總括而言，科技與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交織互動，不同行動者以不同的方法運用科技，或被充權，或被制約，或被「拯救」，行動者的場域據點和資本被改變，科技從正反兩極的方向影響突然新聞產製。本文認為，在科技變遷的背景下，回歸後的香港突發新聞場域在大場域中向右移（圖三），變得更靠近政治、商業和科技極，越受政治、經濟和科技等綜合因素的影響，變得更為順服於政治、經濟與科技邏輯，例如記者的作業常規要更配合警方發布資訊的機制和流程，更倚重官方消息；突發新聞主力在網上發布，亦出現網絡資訊快速零散的特徵。同時，新聞場域右移會更靠近後真相意識形態的一端，令新聞的產製呈現後真相的現象。另一方面，新聞場域距離政治文化科技極和專業意識形態一端更遠，新聞場域的右移對新聞專業影響負面。Bourdieu (1998a, p. 69) 指，記者在場域中的位置和他們的自主度是相對的，位置決定了自主度，自主度的變化也影響了記者的位置。圖三中新聞場域更靠近右極的結果，一是場域出現去專業化的情況，令報章新聞的文化資本貶值；二是新聞場域的他律性增強，自主度減低，新聞自由的空間縮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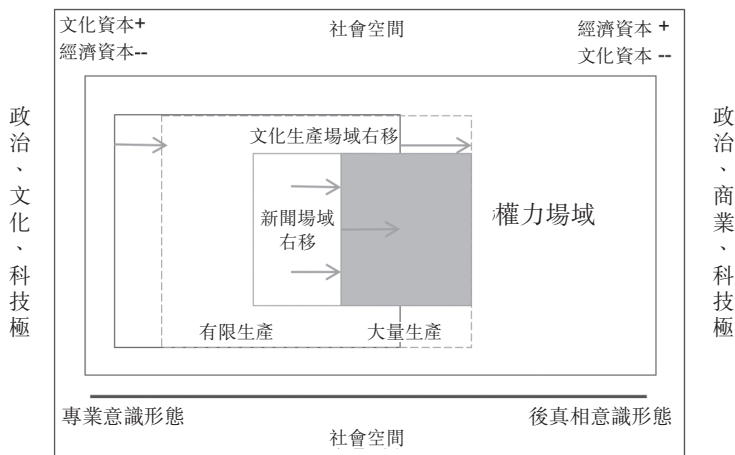
本文由科技變遷的角度切入，從記者的訪談及突發新聞內容分析，反映了新聞場域的變化及行動者的慣習改變。不過，本文有兩大局限，第一，新聞場域的改變並非單一科技層面所能涵蓋和解釋。改變新聞場域及新聞實踐的因素眾多，科技作為其中一股重要力量，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其他影響新聞運作的因素交織，促成新聞實踐改變，推動內容的變化，建議未來研究可從政治、經濟、機構、新聞實踐等不同層面，了解突發新聞的場域變化。第二，本文的新聞內容分析只針對報紙報導，而近年報紙漸漸以社交媒體和手機軟件作為突發新聞發布的重要平台，新聞的實踐和內容與傳統的報紙報導大相逕庭，未來研究可涵蓋這方面的報導，補充本文。

最後，值得注意近年科技的發展令社會中個體行動者突破原有的資訊框架，網民透過網絡連結，組織不同規模的社會運動或示威活動，記者每每透過社交媒體及網上直播，即時並廣泛地報導社會衝突事件，不但衍生成為其中一種主流報導形態，科技更令記者在一定程度上重獲監察警方執法的第四權，建議未來研究可從這方面加以探討。

圖三 文化生產場域及突發新聞場域右移



註釋

- 1 如Lee及 Chu (1998)、Fung (2007)、陳韜文、李立峯 (2009)。
- 2 如Chan (2017)、Lee (2017)、So (2017)、陳韜文、李立峯 (2009) 探討2003年七一遊行前後傳媒相關報導的變化；蘇鑰機、譚麗珊、鄧皓文 (2012) 分析了2012年特首選舉的報章報導；鄧鍵一、程曉萱、蘇鑰機 (2014) 探討報業與香港社會變遷；Au (2016) 研究回歸後新聞界的自我審查。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 3 林天悟 (2012年2月6日)。
- 4 香港警方於2004年開始逐步實行數碼化通訊，2012年1月底警方及消防完成有系統轉換。數碼化通訊前一年，即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新聞大幅報導非典，故此第一個時段的抽樣選在2003年2月非典爆發前一年，2002年是未實行數碼化通訊之前，記者仍可監聽警方通訊，獲得有關罪案和意外的即時消息。
- 5 第二時段的抽樣選在系統轉換完成後的2012年2月，即警方及消防全面完成系統轉換，記者自此不能再從官方獲得罪案和意外的即時資訊。
- 6 這時段警方和消防完成數碼化，並全面地實施新的資訊發放機制之後的第三年，突發新聞被新機制影響後的運作已穩定。與此同時，香港的社交媒體用戶穩步上升，2005年，香港的Facebook用戶上升至500萬（“Facebook claims 5 million”，2016），相比2000年的400萬（Helen, 2014），上升近25%。研究這個時段的突發新聞，可以一併檢視科技和社交媒體對突發新聞報導的影響，特別是在消息來源和圖片來源方面。
- 7 《大公報》、《文匯報》及《商報》。
- 8 《明報》、《星島日報》、《信報》及《香港經濟日報》。
- 9 《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及《太陽報》。
- 10 包括 Dardis (2006)、Shahin、Zheng、Sturm 及 Fadnis (2016)，以及 Windhauser、Seiter 及 Winfree (1990)。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李金銓 (1997年9月)。〈新聞記者的專業意識〉。取自《傳媒透視》，<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md9709/Sep1.html>。
- Li Jinquan (1997 September). Xinwen jizhe de zhuan ye yishi. *Chuanmei toushi*. Retrieved from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md9709/Sep1.html>.
- 林天悟 (2012年2月6日)。〈突發新聞「關機」了！〉。《信報財經新聞》，第A14版。
- Lin Tianwu (2012, February 6). Tufa xinwen “guanji” le! *Xinbao caijing xinwen*, p. A14.
- 陳韜文、李立峯 (2009)。〈從民意激盪中重構香港政治文化：七一大遊行公共論述分析〉。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 (編)，《香港文化政治》(頁53-78)。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 Chen Taowen, Li Lifeng (2009). Cong minyi jidang zhong chonggou Xianggang zhengzhi wenhua: Qiyi da youxing gonggong lunshu fenxi. In Ma Jiewei, Wu Junxiong & Lü Dale (Eds.), *Xianggang wenhua zhengzhi* (pp.53–78). Xianggang: Xianggang daxue chubanshe.
- 黃天賜 (2013)。《新聞已死》。香港：中華書局。
- Huang Tianci (2013). *Xinwen yisi*. Xianggang: Zhonghua shuju.
- 黃順星 (2010)。〈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第104期，頁113–160。
- Huang Shunxing (2010). Xinwen de changyu fenxi: Zhanhou Taiwan baoye de bianqian. *Xinwenxue yanjiu*, 104, 113–160.
- 鄧鍵一、程曉萱、蘇鑰機 (2014)。〈報人、報業與香港社會變遷：《明報》、《信報》和《蘋果日報》的個案探討〉。《國際新聞界》，第36卷第8期，頁23–37。
- Deng Jianyi, Cheng Xiaoxuan, Su Yueji (2014). Baoren, baoye yu Xianggang shehui bianqian: *Mingbao*, *Xinbao*, he *Pingguo ribao* de gean tantao. *Guoji xinwenjie*, 36(8), 23–37.
- 蘇鑰機、譚麗珊、鄧皓文 (2012)。〈特首選舉報章報導：總結與檢討〉。蘇鑰機 (主編)：《特首選舉·傳媒·民意》(頁64–76)。香港：天地圖書。
- Su Yueji, Tan Lishan, Deng Haowen (2012). Teshou xuanju baozhang baodao: Zongjie yu jiantao. In Su Yueji (Ed.), *Teshou xuanzhan, chuanmei, minyi* (pp. 64–76). Xianggang: Tiandi tushu.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doni, H., & Mane, S.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3), 23–340.
- Au, A. K. L. (2016).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constitutive censorship: The case in Hong Kong broadcast news medi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Bastos, M. T. (2015). Shares, pins, and tweets: News readership from daily papers to social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 16(3), 305–325.
- Benson, R. (1999). 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3), 463–498.
- Benson, R. (2006). News media as a “journalistic field”: What Bourdieu adds to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vice vers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3(2), 187–202.
- Benson, R., & Neveu, E. (2005).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Cambridge, UK: Polity.

- Boczkowski, P. J. (2004). The processes of adopting multimedia and interactivity in three online newsroom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2), 197–213.
- Boczkowski, P. J., & Ferris, J. A. (2005). Multiple media, convergent processes, and divergent produc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media production at a European fir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7(1), 32–47.
- Bourdieu, P. (198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R. Nice,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8a). *On television*. New York, NY: New Press.
- Bourdieu, P. (1998b).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5). The political field,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n R. Benson, &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pp. 29–47). Cambridge, UK: Polity.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 Capitol Hill Monitors (2000). *DC Fire/EMS trunked system switch-over coming so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henney.com/chm/0200>.
- Carlson, D. (2003). The history of online journalism. In K. Kawamoto (Ed.), *Digital journalism: Emerging media and the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 (pp. 31–55).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Chan, C. K. (2017). 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localism: The China factor and beyond.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4), 413–432.
- Chan, J. M., & Lee, C. C. (1989).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Editorial stance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17, 97–117. doi:10.1017/s0305741000023663.
- Chan, J. M., & Lee, F. L. (2007). Media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A decade after the handover. *China Perspectives*, 2007(2), 49–57. doi:10.4324/9781315869131.
- Cheung, M. M., & Wong, T. C. (2016). News information censorship and changing gatekeeping roles: Non-routine news coverage and news routines in the context of police digital communications in Hong Ko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3(4), 1091–1114. doi: 10.1177/1077699016628818.
- Corner, J. (2017). Fake news, post-truth and media–political chan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9(7), 1100–1107.
- Couldry, N. (2005). The individual point of view: Learning from Bourdieu’s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Cultural Studies–Critical Methodologies*, 5(3), 354–372.

- Dardis, F. E. (2006). Marginalization devices in U.S. press coverage of Iraq war protest: A content analysis.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9(2), 117–135.
- Domingo, D., Quandt, T., Heinonen, A., Paulussen, S., Singer, J. B., & Vujnovic, M. (2008).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practices in the media and beyon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nitiatives in online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2(3), 326–342.
- Edmonds, R. (2013, June 25). ASNE census finds 2,600 newsroom jobs were lost in 2012. *Poynt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oynter.org/news/asne-census-finds-2600-newsroom-jobs-were-lost-2012>.
- Elgot, J. (2018, February 6). Decline of local journalism threatens democracy, says Ma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8/feb/06/decline-of-local-journalism-threatens-democracy-says-may>.
- English, P. (2016). Mapping the sports journalism field: Bourdieu and broadsheet newsrooms. *Journalism*, 17(8), 1001–1017.
- Esarey, A., & Xiao, Q. (2011).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011), 298–319.
- “Facebook claims 5 million monthly users in HK.” (2016, September 26). *The Standard*.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php?id=80084>.
- Fuller, S. (2018). *Post-truth: Knowledge as a power game*. London; New York, NY: Anthem Press.
- Fung, A. Y. H.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59–171.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Gleason, S. (2010). Harnessing social media: News outlets are assigning staffers to focus on networking.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32(1), 6–8.
- Hanitzsch, T. (2007). Deconstructing journalism culture: Toward a universal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17(4), 367–385.
- Helen, G. (2014). *Culture, aesthetics and affect in ubiquitous media: The prosaic image*. London, UK: Routledge.
- Hermida, A. (2016). Twitter, breaking the news, and hybridity in journalism. In B. Franklin, & S. Eldridge II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pp. 407–416). NY: Routledge.
- Hesmondhalgh, D. (2006). Bourdieu,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2), 211–231.
- Hilgers, M., & Mangez, E. (2015).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field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shire, UK: Routledge.
- Himma-Kadakas, M. (2017). Alternative facts and fake news entering journalistic content production cycle.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9(2), 25–40.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07). *Annual report 2007: Shrinking margins—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Hong Kong: Author.
-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10). *Annual report 2010: The vice tightens—pressure grows on free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uthor.
-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12). *Annual report 2012: New leader raises fears: challenge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uthor.
- Hovden, J. F. (2008). *Profane and sacred: A study of the Norwegian journalistic fiel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ergen, Norway.
- Howard, P. N. (2010). *The 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Islam*. C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gnatow, G., & Robinson, L. (2017). Pierre Bourdieu: Theorizing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7), 950–966.
- Kilman, L. (2015, June 1). World press trends: Newspaper revenues shift to new sources.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n-ifra.org/press-releases/2015/06/01/world-press-trends-newspaper-revenues-shift-to-new-sources>.
- Klinenberg, E. (2005). Convergence: News production in a digital ag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7(1), 48–64.
- Kvasny, L., & Truex, D. (200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 A research paradigm. In R. Baskerville, J. Stage, & J. DeGross (Eds.),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p. 277–293). Boston, MA: Springer.
- Lee, C. C. (1998).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2), 55–73. doi:10.1177/1081180x98003002005.
- Lee, F. L. (2017). Political scandals, “black materials,” and changing backstage imaginary in the Hong Kong press, 2001–2015.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4), 450–465.
- Lee, P. S. N., & Chu, L. L. (1998). The inherent dependence on power: The Hong Kong pres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1), 59–77.
- Lowrey, W. (2012). Journalism innovation and the ec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Institutional tendencie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4, 214–287.
- Martin, N. (2017). Journalism, the pressures of verification and notions of post-truth in civil society.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9(2), 41–56.
- McLennan, D., & Miles, J. (2018, March 21). A once unimaginable scenario: No more newspapers.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03/21/newspapers/?noredirect=on&utm_term=.a3f17744e6b7.

- Moon, S. J., & Hadley, P. (2014). Routinizing a new technology in the newsroom: Twitter as a news source in mainstream media.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8(2), 289–305.
- Napoli, P. M. (2015).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Governance of news platforms in the realm of individual and algorithmic gatekeeper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39(9), 751–760.
- Neuman, W. R.,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ulussen, S., Harder, R. A., & Johnson, M. (2017). Facebook and news journalism. In B. Franklin & S. Eldridge II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pp. 427–435). Abingdon: Routledge.
- Robinson, S. (2009). The cyber-newsroom: A case study of the journalistic paradigm in a news narrative's journey from a newspaper to cyberspa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2(4), 403–422.
- Sales, L. (2017). New ACTU boss says it's OK for workers to break "unjust laws" [Video Fi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7/s4636757.htm>.
- Schiffes, S., Newman, N., Thurman, N., Corney, D., Göker, A., & Martin, C. (2014). Identifying and verifying news through social media. *Digital Journalism*, 2(3), 406–418. doi:10.1080/21670811.2014.892747.
- Schultz, I. (2007). The journalistic gut feeling. *Journalism Practice*, 1(2), 190–207.
- Serban, F. C. (2017). *I am a reporter and you are not: How legacy and digital-only journalists in Hong Kong negotiate their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 Shahin, S., Zheng, P., Sturm, H. A., & Fadnis, D. (2016). Protesting the paradig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s coverage of protests in Brazil, China, and In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1(2), 143–164.
- Sheffer, M. L., & Schultz, B. (2010). Paradigm shift or passing fad? Twitter and sports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 3(4), 472–484.
- Shehata, A. (2010). Marking journalistic independence: Official dominance and the rule of product substitution in Swedish press coverag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2), 123–137. doi: 10.1177/02673231110363654.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 Siapera, E., & Spyridou, L. (2012). The field of online journalism: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In E. Siapera, & A. Veglis (Eds.), *The handbook of global online journalism* (pp. 77–98).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 Singer, J. B. (2003). Who are these guys? The online challenge to the no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4(2), 139–163.

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 Singer, J. B. (2004). Strange bedfellows? The diffusion of convergence in four news organiz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5(1), 3–18.
- So, C. Y. K. (2017). Hong Kong media and politics revisited in 2017: Introduc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4), 333–337. doi:10.1080/17544750.2017.1406840.
- Splichal, S., & Dahlgren, P. (2016). Journalism between de-professional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1), 5–18.
- Sussman, G. (1997).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UK: Sage.
- Swartz, 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ndoc, E. C., Jr., & Jenkins, J. (2017). The Buzzfeedication of journalism? How tradi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are talking about a new entrant to the journalistic field will surprise you! *Journalism*, 18(4), 482–500.
- Thurman, N., & Newman, N. (2014). The future of breaking news online? A study of live blogs through surveys of their consumption, and of readers'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5(5), 655–667.
- Tuchman, G.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doi:10.1086/225510.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Wiik, J. (2010). *Journalism in transiti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wedish journalis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othenburg University, Sweden.
- Willig, I. (2012). Newsroom ethnography in a field perspective. *Journalism*, 14(3), 372–387.
- Willig, I. (2016). Field theory and media production: A bridge-building strategy. In C. Paterson, D. Lee, A. Saha., & A. Zoellner (Eds.), *Advancing media production research* (pp. 53–67).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Willig, I., Waltoer, K., & Hartley, J. M. (2015). Field theory approaches to new media practices: An introduction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MedieKultur: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58), 1–12.
- Windhauser, J. W., Seiter, J., & Winfree, L. T. (1990). Crime news in the Louisiana Press, 1980 vs. 1985.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7(1), 72–78. doi: 10.1177/1077699090006700111.
- Zillien, N., & Marr, M. (2013). The digital divide in Europe. In M. Ragnedda, & G. W. Muschert (Eds.), *The digital divid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55–66). London, UK: Routled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本文引用格式

黃天賜、黃煜、張美鳳、王悅(2021)。〈科技變遷背景下新聞場域的變化——
香港突發新聞之個案〉。《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6期，頁25-61。

附錄 受訪者的編碼名單

編碼	報章類型	職級	年資
A1	大眾報	高層管理	29
A2	大眾報	前線	16
A3	大眾報	中層管理	23
A4	大眾報	中層管理	28
A5	大眾報	前線	19
A6	大眾報	前線	31
A7	大眾報	中層管理	24
B8	精英報	前線	30
B9	精英報	高層管理	35
B10	精英報	前線	31
B11	精英報	中層管理	30
B12	精英報	前線	17
B13	精英報	前線	24
C14	黨報	前線	22
C15	黨報	前線	17